

隋唐五代时期的浙东藏书

冯晓霞

(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图书馆, 浙江 宁波 315012)

摘要:隋唐五代时期,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实质性开发,因而推动了文化事业发展,与此相应浙东藏书的事业也在前人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。这突出表现在浙东众多士人任职朝廷秘书省,参与国家的图书整理和编纂;浙东私人藏书的丰富以及佛教寺院藏书的兴盛。

关键词:隋唐;浙东;藏书

中图分类号: G253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1-5124(2014)01-0040-04

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走向新的繁荣。在这个时期,浙东地区的总体发展虽然比较中原地区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,但此时的浙东地方政治基本稳定,从而使浙东文化得到较快发展,由此推动了藏书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无论是私人藏书、寺院藏书,还是对书籍的整理和创作都步入一个新的时期。

一、私人藏书的发展

文化发展是推动私人藏书发展的基础。隋唐五代浙东藏书的发展,与其文化发展有关。

今天的宁(波)、绍(兴)、台(州)、舟(山)地区,当时分别属越州、明州、台州。在前代的基础上,上述区域的经济长足发展。推动了浙东的教育、文化事业。隋唐五代,科举制兴盛,越州出现了书院教育。唐武德七年(624),下诏诸州、县置学。开元二十六年(738),再令州县置学,明州、越州、台州都开设书院。比如,开元十一年(723),越州城设丽正书院,大中四年(850),象山县令杨弘正于县城西北蓬莱山麓筑蓬莱书院。余姚的书院也始于唐。当时就有余氏书院,在羊岙(今浙江余姚市青山乡),为乡彦余九德住宅,兼读书讲学之处。中和元年(881),吴少圭于诸暨设溪山书院。这些书院都有藏书。《绍兴市教育志》就说书院是“校书、藏书的场所”。^[17] 越州属县诸暨、嵊县置有学宫。当时的

越州州学建于城北隅。元和九年(814),鄞县设县学,会昌六年(846),象山设县学。唐肃宗(756-762)时,台州司广参军郑虔以地方官身份致力于教化事业。这些学宫、书院都有刻书、藏书。《绍兴市志》说:“越州创办的书院用以刻书、藏书。”^{[2][130]} 浙东教育的发展促进科举逐步兴盛。会昌五年(845),唐代政府规定浙东道等所送进士不得超过15人,明经不得超过20人。经过寒窗苦读的浙东士人纷纷出仕为官。上林湖出土瓷墓志中就有“乡贡进士陈周”之名。^{[13][44]}

与此同时,文化也得到发展。隋唐均以能文善诗为荣。浙东成为唐诗之路中心区域,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、孟浩然等诗人来浙东,接踵踏歌而行。李白就四次来越,著有《越中览古》《西施》《王右军》等篇。大历年间,鲍防、严维等人举行大规模浙东诗会。《宁波通史》说:“唐代文人漫游成风,光是从古城绍兴至天台山石梁飞瀑这条全长134公里的水道,就为300多位诗人行旅所及,散落下一串串精美的珍珠,这就是闻名中外的‘唐诗之路’。”^{[13][65]} 教育、科举开办与文化的兴盛,使读书人增多,读书人只有利用书籍,才能进入仕途。这就需要私家有更多的书籍收藏,从而推动浙东的私人藏书的发展。

在隋唐五代,浙东的私人藏书也有一定的发展。由于隋唐经济发展,图书制作手段推陈出新,

收稿日期:2013-01-25

作者简介:冯晓霞(1968-),女,浙江宁波人,副研究馆员,主要研究方向:图书馆学、藏书史。E-mail: fxx@nbdx.cn

私家藏书有所发展。浙东也是如此，由于雕版印刷出现，浙东出现雕刻印刷书籍。唐长庆年间（821-824），元稹任越州刺史，就刻印《白氏长庆集》，在平水市，这部著作还在市场交易，即图书的贸易，一个儿童在读《白氏长庆集》。元稹为《白氏长庆集》所作序中云：“扬、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，卖于市肆中也。”^{[2]2125}正如王国维《两浙古刊本考序》中说：“夫刻石亦可云摹勒。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，则唐之中叶，吾浙已有刊校矣。”这是唐代越州刊印书籍的最早记载，也表明当时已有私人藏书存在。

五代南唐期间的徐锴（920-974），字楚金，会稽人，后迁居广陵。他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书香门第，父徐延休曾仕吴为江都少尹，博物多学，母亲也有文化教养。徐锴幼即聪慧，10余岁时作《秋词》，援笔立成。他家中之书几阅数遍。不仅如此，他尤其喜欢精研文字学，为校勘古籍积累了深厚功底。南唐李王景时，他以校书郎起家，累官至中书舍人。后主李煜时又在集贤院供职，日事校勘，此时，他家中藏书已十分丰富，其中不乏善本。后主雅好文学，曾得《周载齐职仪》一书，后主以问徐锴。徐一一述而无遗漏，人皆服其识书。宋人一向看重南唐藏书，江少虞《宋朝事实类苑·江南书籍》云：“王师平金陵，得书十余万，分厂三馆及学士舍人院。其书多讎校精当，编帙全具，与诸国书不类。”徐锴所作之贡献，故史称：“江南藏书之盛，为天下冠，锴力居多。”^[4]由于徐锴藏书丰富，且勤于学习和著述，因此在学术上，成就突出。他著有《说文解字系传》40卷、《说文通释》40卷、《说文隐音》4卷、《方輿记》130卷等10多种著作，可谓著作等身。

据《绍兴市志》记载，吴越时，越州有“裴氏书楼”。^{[2]2125}

二、寺院佛教藏书规模的兴盛

隋唐五代是我国寺院藏书的兴盛时期。由于政府支持，致使寺院林立，名僧辈出。浙东也是一样，据《续高僧传》与《宋高僧传》记载，隋代有佛寺262所，分布在79郡129县，在今天的浙江境内就有11所寺院，其中浙东有会稽大禹寺、弘道寺，余姚梁安寺，天台佛陇寺、国清寺、称心精舍、瀑布寺，海门灵石智者冬居道场，

临海霞山精舍等9所，占全省的3/4以上。到唐代，今浙江境内有寺院937所，占江南东道的49%，占全国佛寺总数17.6%，而浙东的明州（宁波）为93所、越州（绍兴）160所、台州123所，合计376所，^{[5]486}占全省佛寺40%。

佛寺的兴修致使寺院藏书有所发展。与前代相比，无论是藏书的数量，还是藏书的品种，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明代胡庆麟曰：“凡释氏之书，始于汉，盛于梁，极于隋唐。”^[6]天台山国清寺的藏书就是一例。陈太建七年（575），慧思来到天台山，在高僧定光所住之北峰修建寺院，刻经书。其弟子隋智者大师，讳智顓，字德安，俗姓陈氏，颖川（今河南许昌）人，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。天台山国清寺以隋文帝开皇十八年（598）晋王杨广按智者大师遗愿建成，并赐佛经一藏，并令秘书监柳顾言制《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》。灌顶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也称智顓“造寺三十六所，大藏经十五藏”。^{[5]502}志盘的《佛祖统经》也云：“师造寺三十六所，尝曰：‘予所造寺楼霞灵岩、天台、玉泉，乃天下四强也。’又造大藏经十五处。”^{[7]115}国清寺应该有智顓所刻的经书。入唐以后，仍然是有名的富有藏经的寺院，具体藏经多少不详，有一例可说明国清寺藏书。据《宋高僧传》卷六、《佛祖统经》卷七载，天台宗九祖湛然，俗姓戚，常州人，开元十八年（730），入左溪玄朗之门。玄朗卒后“师挈密藏独运东南”，^{[7]118}住天台山国清寺。“密藏”应该为经书。他还注释智顓真意的《法华玄义释签》20卷，《法华文句记》30卷和《摩诃止观辅行》40卷，这说明国清寺有大量的经书，如果没有佛学经典，要完成注释是有难度的。

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国清寺是东南地区佛经流传至日本最多的寺院。早在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年间，日本僧人最澄来天台山求法，并受菩萨戒，最澄于唐贞元十九年（延历二十二年，803）随遣唐使从难波乘船出海，经过50多天，到达明州鄞县（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），并于九月到达台州龙兴寺，拜见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，从受天台宗教法和《摩诃止观》等书抄本。后从佛陇寺的刑满受法并天台教籍82卷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四月，最澄离开台州到达越州，从龙兴寺沙门顺晓受密教灌顶和金刚界、胎藏界

两部曼荼罗、经法等。五月,最澄搭遣唐使船回国,带回经书章疏等 230 部 460 卷,其中天台宗九祖湛然的著作 19 部 84 卷。^{[9]105}

此外圆仁、圆珍等也都在国清寺等求得经书而归,尤其是日本智征大师圆珍,他立志到唐朝求法,曾到天台国清寺抄录经书。著名佛教学者杨曾文的《日本佛教史》对此做过记载:唐太宗五年(仁寿元年,851),圆珍到达福州开元寺,接着前往台州,至国清寺,听物外和尚讲止观之教。物外是道邃的弟子广修的们徒。在这里,圆珍抄得天台宗教法有三百卷左右。后到越州开元寺。大中十年(856)五月,圆珍回到越州开元寺,再次谒见良墀和尚,得经法文共七十余卷,拜别后又前往天台山。^{[9]117}从杨曾文的记述中,我们可以看到台州的国清寺和越州的开元寺是藏有经书的。

越州(今浙江绍兴)、明州(今浙江宁波)的一些寺院也藏经书。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九载《越州余姚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铭》提到道一法师“手写大藏,手自刊校”。道一座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(754),由此可以推测,天宝之前,龙泉寺即有大藏一藏。大中十二年(858),释藏免为明州栖心寺住持,“凡一动止,禅者必集,环堂拥榻,堵立去会。(藏)免学识涌泉,指鉴岐分。诘难排纵之众,攻坚索隐之士,皆立寒苦雾,坐泮坚冰,一言入神,永破沈惑”。^{[7]276}奉化人释宗亮,家傍月山而居,后称月僧,开成年间剃落纳法。唐武宗会昌间灭佛,宗亮隐居。大中五年(851年)建国宁寺(天宁寺),他为住持。建州守李频作寺碑说:“于清心行不污者,得二十八人,以补其员,广住持也。律僧宗亮、禅僧全祐而已。”宗亮宣传佛学,组织人员缮写经书,“国宁(寺)经藏,载加缮写,躬求正本,选纸墨,鸠聚亲施,建造三门藏院诸功德廊宇,皆亮之力焉”。^{[8]117}会稽山妙喜寺释印宗亦“诵通经典”,最精讲者《涅槃经》,^[10]表明妙喜寺也藏有经书。

浙东高僧的著书,也是寺院藏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。智顛在天台山长期止观习修,总结了慧思定慧双修的佛教思想,逐渐形成了止观学说的理论体系。在天台山,为重病的长兄陈铨写成了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》(又称《童蒙止观》)等著作。智者大师弟子临海章安人灌顶,家法云,

天台第五世祖,他不但把其师智顛的《法华玄义》《法华文句》《摩诃止观》等整理成集,并著有《涅槃玄义》《涅槃经疏》《观心论疏》《天台八教大意》《国清百录》《智者别传》等。

三、书籍整理与编纂的业绩

在隋唐,不少浙东人士参与书籍的整理和编纂。隋唐政府主持图书事业的机构承袭六朝,秘书省依然是主持图书事业的学术行政部门。其主持者和工作人员称秘书监和秘书郎。浙东不少士人出任秘书监和秘书郎。隋文帝即位后,重视文治,优礼学者,牛弘所请藏书,正合其意,故于开皇三年(583)“诏购求遗书于天下”。这次搜书,因为既“勒之以天威”,又“引之以微利”,献书者不少。当时除经史子集外,亦注意收佛经、碑铭和时人手稿。余姚人虞世基当时在秘书省工作,他把姚察所著的《梁史》等手稿收入秘书监。这次献书后,“民间异书,往往间出”。越州会稽(今浙江绍兴市越秀区)人秦系,字公绪,唐代诗人。曾被举荐秘书省校书郎。朱庆余也是会稽人,宝历二年(826)进士,官至秘书省校书郎。晚唐诗人严维为山阴(今浙江绍兴越秀区)人,官终校书郎。这些浙东士人在秘书省工作,主要从事图书的整理。尤其是虞世南在秘书省工作时,对书籍的整理和编纂更是作出了努力。

虞世南(558-638),字伯绝,唐初越州余姚人。其宅在鸣鹤山定水寺(今浙江慈溪宓家埭)。隋文帝即位后,设秘书省,虞世南被选为秘书郎,管理全国经籍图书之事。据资料所载,虞世南,大业中为秘书郎,曾供职于秘书省,利用隋代所藏图书作《北堂书钞》一书,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古类书。该书记载了隋以前的许多可贵资料,对于研究历史,辑佚和校勘古籍具有相当价值。刘餗在《隋唐嘉话》中曾记载此事曰:“虞公之为秘书,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,号为《北堂书钞》。今此堂犹在,而《书钞》盛行于代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更清楚地解释道:“《北堂书钞》,唐虞世南任隋为秘书郎时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。北堂者,省之后堂,世南抄书之所也。”《隋志》已著录此书,并记卷帙为 174 卷。此后,《两唐志》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等则均著录为 173 卷。今日通行的孔广陶校刻本亦为 160 卷。据孔广陶统计,《北堂书

钞》除集部外,引书已有约800种。可见虞世南所读典籍之多。贞观元年(627),唐太宗设弘文馆,这是从事图书事业的机构,“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”,时聚四部书20余万卷,选虞世南等人为学士,进行图书整理。

自唐初收隋典籍及唐高祖令征购典籍,秘书省所藏之书大增。武德九年(633),虞世南由秘书少监转秘书监,领导秘书阁藏书整理工作。他还认真校书、勘误、辑佚。其校写《老子》就是一个事例。

《老子》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广泛流传,《墨子》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都引用了《老子》的文句。韩非注释过《老子》,唐初虞世南曾见过他的注本。为此,唐太宗曾经命他校写《老子》一部。

据路工的虞世南校写的《老子石刻拓本》所载,虞世南校写石刻《老子》拓文,上有“贞观”“开元”“广平开国”“太和殿”等印,正文题名为《老子道德经》,分为上、下两篇,不分章,但有八十一个自然段落。从内容看,道经在前、德经在后。有唐太宗命虞世南校写时所作的说明:

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:“维天之道,司日月以悠久,大圣作,则藉书契以长存,直太史李淳风,向呈王弼注《老子道德真经》上下二篇八十一章,虫蚀靡烂,字句狼藉,缮写者书已不工,补字者更多舛讹。咨尔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厚期毓德,卓落不群,穷百氏之闾奥,探六书之精微,乃锡尔以口口纸,鼠须笔,校讎缺略,厘正同异,以使复古,

口凡前烈。既能俾补致口,充足利益群生,斯实大端,当毋辞劳也。

臣奉书伏读真经,韩非子注似近疏略;河上公注颇觉纷繁,唯王弼言简意深,得老子清静之旨。若其字有谬误,前贤不肯正定,臣何人斯,竟敢辄易。今以王弼书为正,韩、河别注并存,敬写全篇。上读天聪,无任警惕、战栗屏营之至。^[11]

据此,虞世南奉李世民之命校写的《老子》,是以王弼本为底本,用韩非、公本校勘,使三本并存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章玉安. 绍兴市教育志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4: 7.
- [2] 任桂全. 绍兴市志: 第4册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96.
- [3] 傅璇琮. 宁波通史: 第1卷[M].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09.
- [4] 任继愈. 中国藏书楼: 壹[M].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01: 553.
- [5] 金普森, 陈剩勇. 浙江通史: 隋唐五代卷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5.
- [6] 胡应麟. 经籍会通二·少室山房笔丛: 卷二[M].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9: 97.
- [7] 赞宁. 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·大宋高僧传: 卷十二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8] 乐承耀. 宁波古代史纲[M].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1995: 117.
- [9] 杨曾文. 日本佛教史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95.
- [10] 赞宁. 唐会稽山妙喜寺印宗传·大宋高僧传: 卷四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: 83.
- [11] 路工. 虞世南校写的《老子》石刻拓本·访书见闻录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5: 5.

About Book Collecting of Eastern Zhejiang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

FENG Xiao-xia

(Party School of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, Ningbo 315012, China)

Abstract: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, East Zhejiang witnessed a substanti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,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. As a result, book collecting entered a new stage. Many scholars of East Zhejiang had posts of book collecting in the court; East Zhejiang had a prosperous time in book collecting by individuals and temples.

Keywords: the Sui and Tang; Zhejiang; book collection

(责任编辑 张文鸯)